



1997年末，中华书局离开了繁华的王府井大街，入驻当时还略显冷清的丰台区太平桥西里一幢白色的大楼。

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，四周高楼渐多，人群渐密，不远处的西三环上，穿梭不息的车流日显拥挤，但中华书局始终安守着本分，似乎很少与周边的世界发生关系。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对于这个近在眼前的名社，并不熟悉，甚至很陌生。

直到2017年1月6日，中华书局伯鸿书店试营业，很多人才第一次走进这家传统文化出版重镇，才知道这些每日出入于这幢白色大楼的邻居们，原来在经营着这样一份事业。

伯鸿书店的店面不大，不足200平方米，青砖灰瓦，修竹老槐。春节刚过，两扇门上，一边贴着“福”字，一边贴着“春”字，颇有几分老北京民居的风韵。店内被3000多种书填得满满当当，远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的《资治通鉴》《全唐诗》，近至新出版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《本草中国》，举凡传统文化涉及的古籍整理、文史研究、普及读本，无所不包。在有限的空间里，还摆下了几把座椅、几张书桌，读者可以坐下来读书品茗，也可以望望窗内窗外的风景，发发呆。

“躲进书斋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。”媒体人李婧璇住得不远，闲暇时，她喜欢在书店里坐上一个下午，从阅读中享受难得的安静。不少人像她一样，一来到这里，就会想起“两竿竹见君子，十万卷书思古人”这副旧联。

两年前，退休干部任冰山刚搬到太平桥西里时，这个位置尚是七八间小门脸，开着几家杂货店、服装店。这位老北京对新家周围的环境早就心中有数：城乡结合部，流动人口多，文化底蕴不深。没承想，几个月之后，小店不见了，伯鸿书店取而代之，这让素爱读书、藏书的任冰山颇感惊喜。每每经过书店，他都会进来看看上了哪些新书。

“书店开业这一年多，我基本没断了买。像《中华好诗词》《陟彼景山》都是‘一版一印’，《评书三国演义》是连雨如、贾建国夫妇的签名本，《燕京旧画全编》是画家李滨声先生的签名本，《资治通鉴》与

家国兴衰》是作者张国刚教授签名的毛边书。”从年轻时代起，任冰山就常逛书店，但对于中华书局的出版物，他总是敬而远之，“在我过去的印象里，中华书局的书大多是给学者用的，和老百姓的关系不大。进到这个书店才发现，他们跟上了时代的脚步，有很多‘接地气’的普及读物。而且因为学术积累深厚，这些普及读物无论是文化品位还是编校质量都堪称上乘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。”



除了逛书店，任冰山还常到书局二楼参加“伯鸿讲堂”。“伯鸿讲堂每月举办一次，主讲人都是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。为了听上一场讲座，有的读者从外地远道而来，而我们社区居民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，可以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。我们还有一个书友微信群，及时分享讲堂的最新信息。”据任冰山观察，讲堂的听众不仅有中老年人，还有不少大学生乃至中小学生，“伯鸿书店、伯鸿讲堂，拉近了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与传统文化的距离，让孩子们多了一个感受优秀传统文化氛围的空间”。

“伯鸿书店的图书品种远不及那些大的图书卖场或者网上书店，但这里集中展示了各种类型的传统文化图书，是独一无二、不可替代的。”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看来，伯鸿书店是一个可以读、可以买、可以聚、可以叙的场所，不仅社区居民，到书局访问的众多学者、出版人也都会在书店驻足，“中华书局传播优秀传统文化，靠的主要就是这一屋子的书。我每次给大家介绍的时候，心里都很自豪。”

不久前，读者范永平在伯鸿书店偶遇徐俊，读者、编者相谈甚

伯鸿书店：老字号的新名片

□ 杜羽撰文并摄影

欢。雅好楹联的范永平自拟一副对联“长欣我辈买书富，唯恐后人卖纸贫”，而长于书法的徐俊欣然提笔，在他购买的新书上录写此联以作留念。伯鸿书店经常邀请作者来为图书签名，笔、墨是常备的。

“多了一个图章、一个签名，书的主体内容虽然没有变化，但读者

能感到与作者、编者的距离更近了。这也是读者对我们的认同。”徐俊常常告诫书店的同事们，要珍惜读者的这份认同，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对待每一本签名本，即使多年之后，读者看到书上的图章、签名仍能感受到一份温暖。

读者对签名本的需求有时超出了很多出版人的想象。中华书局退休编审崔文印、许逸民学殖深厚，但一辈子为人作嫁，很少走到前台。伯鸿书店把两位先生请来，为他们曾经点校、撰写的《大金国志校证》《靖康稗史彙证》《西阳杂俎校笺》《庚子山集注》《古籍常识丛谈》《古籍整理释例》等图书签名。很短的时间里，读者就通过实体店和微店购买了200多本签名本。论销量，毫不逊于一些名家。

上海读者包豪勤在伯鸿书店微店留言说：“伯鸿书店是最专业的书店，因为只有这家书店能真正地明白读者的心思，明白实体店所具有的优势。”

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激励了几代出版人的名言：“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，不能不希望教育的进步；我们希望教育进步，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。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，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，却比任何行业大些。”2017年4月23日，在伯鸿书店正式营业的仪式上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在这段话中又加了一句“我们希望书业进步，就不能不希望书店进步”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困境，如今，实体书店的当代文化价值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。对于中华书局这家拥有106年历史的老牌出版机构来说，年轻的伯鸿书店无疑已经成为了一张崭新的名片。近来，中华书局的诞生地上海、滨城大连等城市都伸出了橄榄枝，希望中华书局到当地开办书店。

“城市需要书店，尤其需要有文化特色和品牌影响力的书店。伯鸿书店创办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已经初步具备了自己的特色。”徐俊希望，未来伯鸿书店能走进更多社区、学校、文博单位，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得更远更深。



书店的窗里窗外

江南村庄的百年变革史

□ 阿迟邦崖

界岸人家，是当地人自称的。位于张家港一条圩岸的两侧，原本聚居了百多户农家，老爨新生，入驻外乡，流转沉浮。

几百年来，沧海桑田，如今岸基已尽数淹入了河心，居民也都搬去了镇上。所剩下的，唯有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情愫了吧。

黄健，一个机关干部，深恐故土就此湮没，后代无根头可忆，在退休后耗费3年，采访44位村民，根据他们口述的尘封已久的往事编录成这本《界岸人家：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）。

本书以年代划分，共4章，在“民国旧事”中，或忆曾为名门望族，办学造桥，福荫一方；或叙旧时的习俗，童养媳外也有童养婿，“叔接嫂”式的“搭伙夫妻”；或叨传闻逸事，“可恶的东洋人”“鸦片烟”“蜘蛛精”等掌故。

“公社岁月”讲分田租地，艰难时世，批斗折痕，那时真会为了像李贵才老人说的“一碗腌菜放不放油”而决裂，直到读书、当兵，看见生活的新希望。

“改革年代”讲那年代村干部

的廉洁、敬业与朴素，也讲奋斗逐梦。比如在钱贵贤老人身上可以看到第一代下海人的缩影。这一章从寻常人家具体的、平凡的琐事中，折射底层人近百年的命运和生活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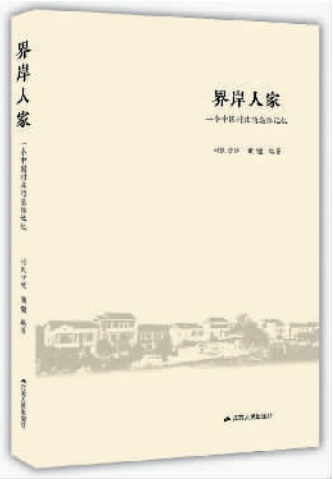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是口述之故，宛如原汁味的促膝夜话，一页页翻看这部江南人家的变革史，分外亲切，又无限感慨。黄健曾说著述本书是“为古老家园唱一首怀旧的歌”。

诚然，书中言及之事已一去不复返，人们的生活只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但此书真意远不止此。黄健出身贫寒，深谙百姓之苦，一直关注“三农”问题，本书所记也有意引导人们对“三农”问题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。

本书时间跨度约一个世纪，上可追溯至晚清，当时的体制为自给型的小农经济，江南人口密度大，土地呈碎片化，加之时局动荡，普遍贫困，消费指数远远撑不起市场。三民主义对不少国民的意识形态也造成了冲击，开始摆脱小农经济的框架，但是农业自始至终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作用。此外，还有土地分配严重不平等现象，土地

改革应时爆发。为了维护集体经济，开始试验人民公社，但无法解决根本的矛盾。改革开放正好促成小农与土地的分离，市场经济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发展。

在滔滔历史洪流中，界岸人家的生活蒸蒸日上，旧式农民也逐渐退出舞台，田地交到了新型农民的手中，除了作物的种植和劳作，他们更把重心放到了技术和营销上，实是大势所趋。



塑封新书得不偿失

□ 周慧虹



不知从何时起，书店待售的图书大都被塑封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读者只能看书封，不能拆阅，似乎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图书，真的有必要塑封吗？

不可否认，塑封有利于保护图书。它使得图书无论是在运输还是售卖过程中，皆可免遭污损，保持良好品相。

但塑封的存在，不啻于在读者与图书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。一本书究竟合不合读者之意，起码要大致翻一翻才能约略知晓内容和文字风格，可因了塑封阻隔，翻阅愿望化为泡影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读者购买的欲望。过去诸多商场货柜林立，顾客想要购买中意商品必须由售货员递送，促使许多书店早就实行了开架售书。读者无论买不买书，都可随意地走进书店，信手拈起一本或匆匆浏览，或细细品味，体现了书业中人的宽容大度，一度颇受读者好评。如今，超市、商场普遍都向顾客敞开怀抱，图书售卖却多出一层塑封，将自己封闭了起来。这种逆向变化，有点弄巧成拙。

塑封也增加了图书成本。塑封一本书约需两毛多钱，看起来似乎不是多大的事儿，但在图书出版持续增长，图书利润率愈益下滑的今天，每本书若能节省这两毛钱，集腋成裘，书业整体由此形成的绝对节约额亦还可观。

图书是否采用塑封包装，还涉及环保问题。众所周知，塑料含有聚丙烯、聚乙烯等，是不可降解材质，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，为了应对“白色污染”，国家一再倡导尽可能减少塑料的使用。图书大量使用塑封，既浪费资源，又危及环境。

无论是从方便读者还是着眼环保考虑，塑封这一“标配”不要也罢。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，作为“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”，除了在内容上务求经典，装帧、发行、销售等各个方面亦需更多地体现出人文精神、文化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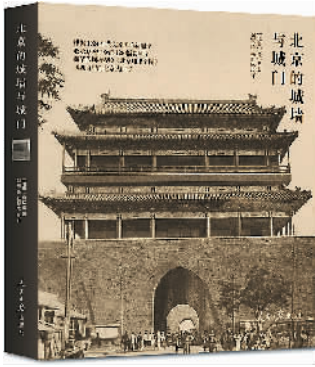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的城墙与城门

近日，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所著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经刘颖重新翻译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是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通过对北京的城墙、城门进行长达数月的实地考察和测绘，并结合历史文献写作而成。书中不仅对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墙和城门进行了科学而细致的记录，还收录了129张珍贵的老北京照片和53张老北京城门建筑测绘图。读者不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中国建筑艺术的壮观，还可以欣赏百年前北京城的真实风采。

本书根据1924年英文原版重新翻译出版。作者喜仁龙（Oswald Siren，1879—1966），瑞典艺术史学家。曾供职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、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。



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十分热爱，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自1920年至1956年间曾多次访问中国。关于中国的主要著作有《北京的城墙和城门》《中国雕刻》《北京故宫》《中国绘画史》《中国花园》等。

（毕春月）

清淡漾心漪

□ 江泽涵

江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《金陵子弟江湖客》，是诗人余光中的一本散文集。

本书无序无跋，30篇散文分为4卷，也未设卷名，以乡愁这个不老话题为灵魂将之凝聚，也未见散疏。时光流转，余光中不管身处何方，濡染了多少沧桑，始终割不断的还是那绵绵不绝的乡情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余光中能将各客居的江湖地也当作故乡来处，这样的人必定怀一颗敏锐但笃静之心，视拼搏为常态，随遇而安。他在《没有人是一个岛》中犀利指出：“《桃花源记》里的生活虽然美满，但如果要我选择，我宁愿选择跟随诸葛亮在西蜀奋斗，因为诸葛亮必须争取明天，而明天对桃花源中人并无意义。”

卷一以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开篇，虽是实写生命与火车相关的若干印象，但大有统贯全书之意。《金陵子弟江湖客》写于2000年重返母校南京大学之后，弥漫着一抹淡淡的哀愁。《思蜀》回忆中学时光，昔日的师长和同窗，仿若就在昨日。《新大陆，旧大陆》是阔别半世纪回归后的感恩。

当中二卷分写香港和台湾的岁月，追念过往情分的如《前贤与旧友》，缅怀“次故乡”的如《思台北，念台北》，洋溢闲情的如《花鸟》《牛蛙记》，无不生动诙谐。

卷四着重讲述海外印记，如三访西班牙时的《雨城古寺》，四度旅美时的《从西岸到东岸》，还有《不朽，是一堆顽石？》这篇被多次收录文集的名作。

“淡而有味”，是公认的散文境

界，然而，举重若轻千斤重，且须百炼功。淡是形，指语言恬淡。本书几乎是口述，没什么甜腻、惊悚的文句，若是撤换却也为之可惜。味是意，指言之有物。传统散文以叙事、抒情为正宗，以叙事为底，蘸之以情，若是脱离了事件，空抒情感，就会腻人。余光中本是土生南京人，少年求学去了乡下成都，后迁居香港，考上台大，再赴美进修，学成后任教于两岸三地。本书勾勒出了余光中大致的生平和性情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也是他的半部自传。

